

4

五经与太学

太学建于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是汉武帝的文治措施之一，教学侧重于德育，内容为儒家的五部经典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太学的设立创造中国教育史的两大先河：首先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学；其次，太学的考核机制与仕途挂勾，只要通一经便可任官，这种模式对隋唐的科举制度影响深远。因此太学无论是在两汉，还是对于后世的影响，都是非常深远的。

我们可以从文化史角度切入认识太学，第一部分会先简介五经内容，继而从两组文物：海昏侯墓竹简以及熹平石经入手，探索「五经」在两汉的地位。第二部分将探讨太学系统的运作，带出两汉兴衰与太学的关系。

五 经

许多汉代出土的文献材料及文物都有「五经」相关的字眼，比如海昏侯墓出土了不少「五经」的竹简，熹平石经则列明「五经」的内容，两组文物均体现「五经」在两汉风行及其广泛影响士大夫阶级。在具体探索这两组文物之前，我们更宜先了解「五经」到底是什么，以及两汉的政府和士人推崇五经的原因。

什么是「五经」

「经」即经典，「五经」是五本儒家的经典著作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它们是汉代官方认可的教授材料，用于太学课程。董仲舒¹认为时下书籍「诸不在六艺²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」，因此提倡「罢黜百家，

¹ 董仲舒（公元前192年—公元前104年），西汉著名的经学家、思想家和政治家。他治学以公羊学为主，于景帝年间任为博士，于武帝时受赏识在江都相等职位

² 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

独尊儒术」。由于学习「五经」是开启仕途的第一步，此举令儒家地位提高，成为正统，更促进了社会的学习风气，开启中国士人的经学传统。

五经的作者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作者不明，或是「三代圣王」³，或是他人，孔子之世以前已有之；至于《春秋》，孟子则认为乃孔子所作⁴。这五本书是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的教材，孔子和其弟子均有修习⁵。

五经与儒家关系密切，普遍认为这五本书均由孔子修编成书，为儒者「内圣外王」必修之术。这五本书涵盖文学、历史、礼仪和宇宙观，既可薰陶情操，又能培养个人鉴古知今和是非判断的能力。三代圣人的事迹，为儒者提供了行为规范，尚贤思齐，潜移默化之下，自然而然地就能成就「君子」。

两汉政府为什么推崇五经？

尽管孔子及后学也有提及其他典籍，但只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五书被尊为「五经」，此无疑与其道德教化功能有关⁶。以下将逐一探讨：

《诗》

孔子认为「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」⁸。《诗》又称「诗三百」⁹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。周有采诗制度，乐官采集民间歌曲，整理并加以配乐，让周天子了解民情¹⁰，惟歌谣是口耳相传性质，作者身份无从稽考。其成书时间不迟于公元前六世纪¹¹。《诗》的题材涉及农耕、婚嫁等习俗¹²，又有记录贵族宴饮的情况¹³及周王室的宗庙祭祀¹⁴。

³ 三代即夏、商、周；圣王是指圣君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

⁴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」

⁵ 徐复观：《中国经学史的基础》（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2），页7

⁶ Michale Nylan.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.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17). p.12

⁷ 对《诗》的解读到汉代有四家，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三家统称为「三家诗」，属于今文学派，是官学课程；而毛亨和毛萇另立《毛诗》，是为古文学派。现时只剩下《毛诗》和《韩诗外传》，其他版本已经散佚

⁸ 《论语·季氏》

⁹ 「三百」只是约数，具体数目有加减

¹⁰ 《诗经》中的歌谣原本是能配乐歌唱的，但是乐谱已经散佚

¹¹ Michale Nylan.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, p.21

¹² 称为风或国风，作者多为平民

¹³ 是为小雅及大雅，作者是贵族

¹⁴ 颂，较为庄严的乐曲，述祖先之德而求庇佑

孔子对《诗》曾有此评注：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无邪』」¹⁵，《诗》不但是合教育、讽刺为一体的作品¹⁶，聆听音乐有安抚心灵、陶冶情操之效，可以促进修养，所以「诗之教」备受儒家推崇。

《书》¹⁷

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」¹⁸，孔子尚古，尤其推崇周文，欲效法周公，所以有此感慨。那么孔子是从何得知周的事迹？那便是从《书》中习得。

《书》又称《书经》或《尚书》，成书时间应与《诗》相若，作者不明。《书》为记言体，篇目以时代划分，记述时期涵盖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上起尧、舜，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，其内容主要记录君主事迹、君臣之间的对话，有劝戒之辞，也有谋议、战争的动员和誓师。

《尚书》在汉发展成三家：「欧阳氏学」、「大夏侯氏学」和「小夏侯氏学」¹⁹。武帝年间，三家均为博士，授今文版《尚书》。惟三书现已失传，只能从熹平石经推测欧阳氏本的面貌。

学习《书》有助认识上古时期的历史和政治思想，从上古贤王的身上学习君臣相处。将之列于「五经」之一，意味昭然若揭。

《礼》

「礼」包含一切仪式，也泛指庄重的行为，所以其不但是文化的载体，也有约束的功能²⁰。子曰：「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」²¹，礼对个人修身，甚或国家统治均有巨大影响。

《礼》分为六大章节²²，每章均对应不同官职所作，记述其职能及规范、周代的行政机构及其管理模式，折射出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。西汉时本无其书，刘德²³得《周官》古文经后上贡朝廷，始有此书²⁴，又因荀悦²⁵与刘

歆²⁶更名才被称为《周礼》。王莽²⁷志于重建周代政府管理架构，《大戴礼记》和《小戴礼记》²⁸均被纳入太学课程内，教授诸生。

《礼》原本是周代的官制，但发展至汉《礼记》，官位的职能许多已被删减，使其道德意味更为浓厚。剩下的诸如〈大学〉、〈中庸〉等章目更是直指进学成德、为人处世的办法。

《易》

「易」即变化。孔子曾感叹若生命再多数年，在五十岁读《易》，此生就可以不犯大错了²⁹，这足见孔子对《易》的推崇。古有「三易」的说法³⁰，但《易》的成书时间不明，作者也无法查考。前两本已失传，只剩下《周易》³¹。因为《易》是一本占卜书，所以免于秦火，是「五经」中保存得最良好的作品。

《周易》内容玄妙无穷，涉及天文历法，接通于「道」³²，有趋吉避凶之效。当中有六十四卦，每卦的经文分为符号和文字两部分³³。因为《易经》晦涩难懂，所以后人作传解释。《易传》的内容分七个部分，共十篇，故称「十翼」³⁴。

《周易》是卜辞³⁵，体现占卜的平民化³⁶，透过随意投掷就能得到一个随机爻（音：淆）象，翻查《易》便得出答案。先秦诸子都认为自己的学派最合于「道」，这个道不但是人世的「道」，比如为政道、人道，更是接通一种冥冥中的神奇力量——世界的规律。未必所有事情都有答案，想不通时，知识份子就会诉诸形上答案。

虽然汉初的思想形态在黄老道家与儒家间拉锯，但《易》是两家都会修习的学问。将之列于「五经」，是因为其具神奇的指引性，对知识份子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¹⁵ 《论语·为政》

¹⁶ 《毛诗·序》：「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」

¹⁷ 《书》和《诗》、《礼》和《春秋》均不能幸免于秦火，不过当时有一知识分子——伏生将《尚书》藏于壁中，保留了下来，是为今文经。不幸的是遭受战乱和社会动荡，《书》在汉初仅剩下二十余篇，伏生在齐、鲁之间教学，而后来成为尚书博士的欧阳生和张生都是师承伏生。见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「秦燔书禁学，济南伏生独壁藏之。汉兴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齐鲁之间」

¹⁸ 《论语·述而》

¹⁹ 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「迄孝宣世，有欧阳、大小夏侯氏，立于学官。「欧阳氏学」、「大夏侯氏学」和「小夏侯氏学」的作者分别是欧阳高、张生弟子夏侯胜和夏侯建

²⁰ 《论语·雍也》：「子曰：『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』」

²¹ 《论语·宪问》

²² 《礼》又称《周官》、《周官礼》和《周官经》，有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考工记》六章

²³ 刘德（公元前160年代—公元前129年），西汉宗室，封河间王，谥献，是为河间献王

²⁴ 班固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：「恭王初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，闻钟磬琴瑟之声，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」

²⁵ 荀悦（148年—209年），字仲豫，东汉末史学、儒学思想家、政治家

²⁶ 刘歆（？—23年），字子骏，改名刘秀，汉朝宗室，西汉末年及新朝官员及重要学者，协助王莽篡位，出任新朝高职「羲和官」，号称国师，晚年却因儿子被杀与误信预言，谋叛事败自杀。刘歆博览图书，精通经学，提倡古文经学，推动把《左传》及《古文尚书》等古文经列于学官，引发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；他曾与父亲刘向一同校阅官庭藏书，编成目录学的重要著作《七略》及《别录》

²⁷ 王莽（公元前45年—公元23年），字巨君，西汉末年政治人物及权臣，之后篡夺皇位并自立新朝

²⁸ 另加〈月令〉、〈明堂位〉和〈乐记〉三篇

²⁹ 《论语·述而》：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」

³⁰ 《周礼·春官大卜》：「掌三易之法，一曰连山，二曰归藏，三曰周易」。三易即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

³¹ 有说《易》乃周文王所作

³² 世界的规律

³³ 黎子耀：《周易导读》（北京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08），页9指出周人以天文历法中的象数组织卦爻，有阳爻（—）和阴爻（--）两种。三爻构成一卦，有八种形式，是为八卦（干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巽、艮、兑）；八经卦与八约卦相重，则得六十四卦

³⁴ 《象传》上、下，《像传》上、下，《文言》，《系辞》上、下，《说卦》，《序卦》和《杂卦》

³⁵ 占卜的记录

³⁶ 材料能在生活中找到，诸如蓍草、龟甲和铜钱

《春秋》³⁷

《春秋》是中国首部编年体史书，记录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间鲁国十二位君主的历史，反映鲁国的内政、外交、战争等大事。《春秋》所录时期是东周前半部分，后来也因而命名为「春秋」。该书或由鲁国史官集体编写，或为孔子作品³⁸。

《春秋》所记时间清晰，每篇都是按照年份、季节、月、日排序，先记时间再以短句叙事。这种书写模式被称为「春秋笔法」，其不直接表达态度，反而在选材、用字等方面委婉表示。汉武帝在「五经」中尤其偏爱《春秋》³⁹，令《公羊》成为西汉的官学；宣帝则偏爱《谷梁》，其与《公羊传》出现分庭抗礼之势。

《春秋》是历史书，也蕴藏作者的价值判断，所以具道德意味，儒者阅此可以明是非，知善恶，故不作与身份冲突之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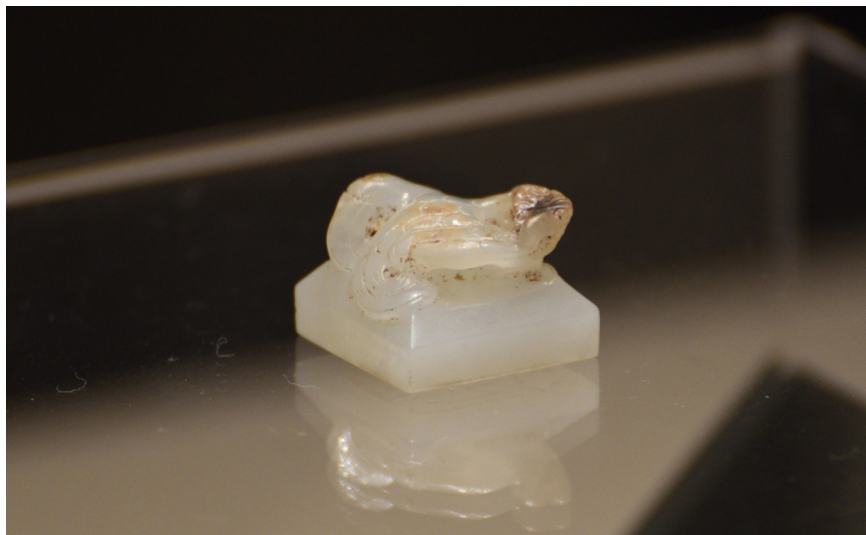
小结

「五经」是把五本儒家典籍列为经典，在大学教授经书的目的是培养生员的全人发展：《诗》温柔敦厚，有薰陶情操之效；《书》尚友古人学习为政之道；《礼》厘明职责，培养德位相称的人才；《易》内容奥妙，通于「道」；《春秋》明是非，重思考。「五经」系统发展至后代已经不限于五本，到了明代甚至有《十三经》⁴⁰。「五经」的设立无疑提高儒家的地位，令其在诸多学派中脱颖而出，「经学」在汉以后更成为中国学术的正统。

文物与五经

（一）海昏侯墓

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鄩墩山，是汉废帝刘贺的陵墓。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⁴¹，由于宣帝无后，所以霍光改立昌邑王刘贺为汉帝，但其在位仅仅27日被废⁴²，后被改封为海昏侯⁴³。



海昏侯刘贺印外观
(图片来源: Wikimedia Commons)

³⁷ 《春秋》所记之事言简意赅，所以有五家作传解，分别为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邹氏传》和《夹氏传》。《邹氏传》和《夹氏传》现已缺失，而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被合称为「春秋三传」。有说《左氏传》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，所以又称为《左传》，是古文经，以叙事为主；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是今文经，以解经为主。有说《公羊传》作者为战国时期的公羊高，而《谷梁传》作者传说为春秋时的谷梁赤。两传共同点在于以问答形式解读《春秋》，然后判断其中的微言大义。

³⁸ 徐复观：《中国经学史的基础》，页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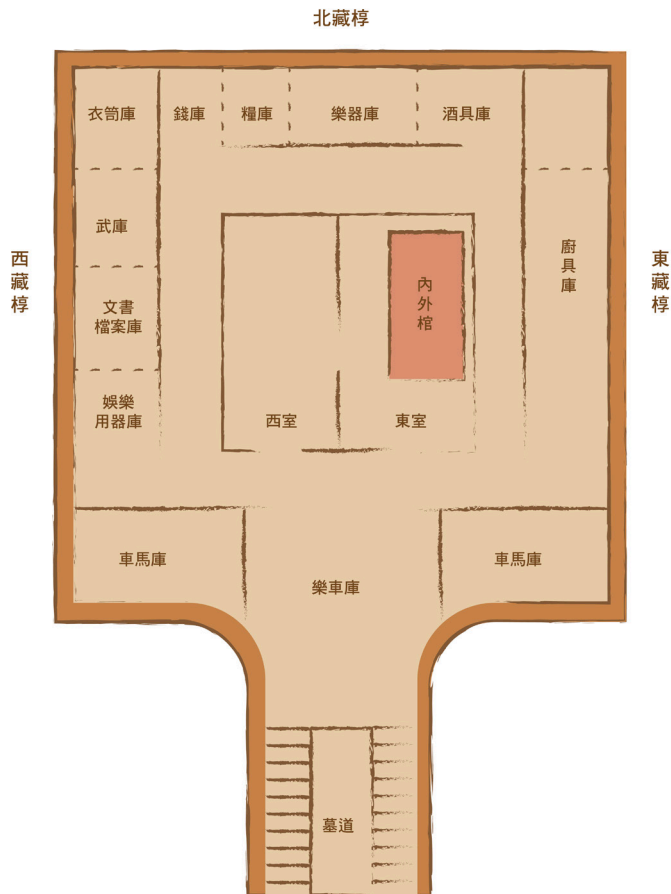
³⁹ 班固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「汉武帝时尊公羊家，诏太子受公羊《春秋》，由是公羊大兴」

⁴⁰ 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和《孟子》

⁴¹ 《汉书·诸侯王表》：「昌邑袁王髡武帝子。天汉四年六月乙丑立，十一年薨。始元元年，王贺嗣，十二年，征为昭帝后，立二十七日，以行淫乱，废归故国，予邑三千户」

⁴² 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「元平元年四月，昭帝崩，毋嗣。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。六月丙寅，王受皇帝玺绶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癸巳，光奏王贺淫乱，请废。语在贺及光传」

⁴³ 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「三月，诏曰：『盖闻象有罪，舜封之。骨肉之亲絜而不殊。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。』」



海昏侯墓墓室平面图

(重绘图, 图片来源: 中国文化研究院: 〈千古大墓——解构海昏侯墓〉, 网址: <https://chiculture.org.hk/tc/china-ive-thousand-years/4386>)

该墓自2011年开始发掘, 为近年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墓中出土一万余件文物, 当中有五千多个简牍, 许多是西汉时期的文献, 内含五经之三: 《诗》、《礼》及《春秋》, 且有不同版本及其注释⁴⁴, 又有一面镜屏。该屏特别之处在于背后有儒家师徒的图画, 这是现有最早的孔子画像, 故学者暂称为「孔子衣镜」⁴⁵。

我們從海昏侯墓發現甚麼？

直到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技術, 紙才開始廣泛成為文字的載體。由於海昏侯劉賀是西漢人, 在蔡倫之前, 其墓穴發現的簡牘便是當時主要的書寫面。

竹簡厚重, 不便攜帶, 抄錄麻煩需時, 平民不可能擁有五千多卷。劉賀墓出土的竹簡數量龐大, 一方面證明墓主人身份高貴、富裕且喜愛閱讀; 另一方面, 「五經」有三本被書於竹簡, 反映「五經」的風行程度, 即使是曾為漢帝的劉賀也將此收於墓中, 足見「五經」的重要性。

墓中發現的「孔子衣鏡」呼應上文的說法。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, 生前因為政治失意所以辦學廣收門徒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, 諸侯均行霸道, 主張王道的儒家學說並沒有凌駕的地位。然而, 在漢廷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, 大力提倡以五經授課, 孔子乃至儒家的地位大為躍升, 海昏侯墓中「孔子衣鏡」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證據。

(二) 熹平石刻



熹平石經
(图片来源: Wikimedia Commons)



熹平石經拓片
(图片来源: Wikimedia Commons)

⁴⁴ 杨军、徐长青: 〈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〉, 《考古》, 2016年07期, 页61

⁴⁵ 同上注

太学

(一) 太学成立背景

武帝建太学绝非一时兴起，当中有许多社会政治考虑。为了能长治久安，汉初文人积极反思秦速亡之由，得出结论：秦焚书坑儒、不重学风、暴力统治，导致社会缺少道德教育，难以稳定人心⁴⁷。从汉开国至景帝年间，君主贯彻轻赋税、重农业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国家累积财富⁴⁸。汉景帝肃清七王之乱⁴⁹，武帝更凭借中央集权完成国家的大一统。兴办学校需要众多资源，父辈的努力耕耘，无不为了武帝的「文治」奠下基础。

武帝即位之初就有许多大臣上疏复兴儒学⁵⁰，不过窦太后⁵¹阻挠，未能成事。直到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思想及文化与道德教育的贫乏，不利统治与国家发展，亦为了避免重蹈秦穷兵黩武的覆辙，武帝便采纳董仲舒与公孙弘⁵²等人的提议，于长安建设中国史上首个官办教育机构——太学。除了《诗》和《春秋》被选为课程，更另设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，由「五经博士」教授儒家经学，为政府培养人才⁵³。

(二) 太学的发展怎样反映两汉历史？

太学建于元朔五年，汉武帝在长安设立校舍，收生员五十人。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太学发展迅速，由于汉廷重视办学，因此太学收生规模不断扩张。从武帝时期的五十人，发展至昭帝时期的百人，元帝时期的千人；到成帝末年，太学收生已扩展至三千人⁵⁴。由于生员数目庞大，王莽在平帝时期开始扩建校舍，令太学规模足以容纳万人，史称「筑舍万区」⁵⁵。

⁴⁷ 贾谊《过秦论》：「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驭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捶笞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……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；堕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……」

⁴⁸ 司马迁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：「至今上即位岁数，汉兴七十余年之闲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」

⁴⁹ 七王之乱（七国之乱），发生于公元前154年。当时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：楚王刘戊、胶西王刘卬、胶东王刘雄渠、淄川王刘贤、济南王刘辟光、赵王刘遂，由于不满朝廷实行削藩政策，剥夺地方诸侯权力，所以兴兵反抗，最终为窦婴、周亚夫所镇压。

⁵⁰ 班固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：「建元元年冬十月，诏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。丞相绾奏：『所举贤良，或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，乱国政，请皆罢』奏可。」

⁵¹ 窦太后（公元前200年代—公元前135年）为汉文帝皇后、汉景帝生母、汉武帝祖母。窦氏掌握政权横跨景帝、武帝两代，主张「无为而治」的黄老之术。

⁵² 公孙弘（公元前199年—公元前121年），字季，武帝时曾担任御史大夫、官至丞相，封平津侯。

⁵³ 《诗》和《春秋》在景帝时已置博士。章权才：《两汉经学史》（台北：万卷楼，1995），页86。

⁵⁴ 班固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「昭帝时举贤良文学，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，宣帝末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经者皆复。数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为设员千人，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。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莽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学弟子少，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。」

⁵⁵ 班固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「是岁，莽奏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为学者筑舍万区，作市、常满仓，制度甚盛。」

什么是熹平石经？

熹平石经是作于东汉熹平四年（175年）的刻石，共四十六碑，高十尺，宽四尺、共二十余万字，立于东汉首都洛阳太学门外⁴⁶。遗憾的是，刻石多受损坏，现存百余块残石存于中国各大博物馆。

自武帝始「五经」成为官学，然而秦火与战争令五部经典散佚，时人依靠记忆背诵出来，是为今文经。后经书的原版（古文经）相继出现，且在社会流传。学者争辩何者为正确，所以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。汉廷拥立今文经，以此为太学的教材，设五经博士教授。

至东汉时，「五经」已广泛流传，但是经书反复抄写，文字多有错漏。所以在灵帝时期，朝廷便校订经文，将之刻于石碑，因此产生了熹平石经。是故石经记载了「五经」名称及东汉时期官方认可的版本。除了「五经」，石经亦包括《公羊》、《仪礼》等与五经相关的典籍。

小结

无论是西汉海昏侯墓还是东汉熹平石经都有「五经」的记载，可见「五经」具官方认可，是极为重要的官学典籍，在两汉有超然的地位。

⁴⁶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·序》：「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」

时至东汉，汉室迁都洛阳，建武五年，光武帝刘秀在洛阳新立太学。明帝时期，皇室、诸侯及大臣之后代均修经学⁵⁶，且另立「四姓小侯学」⁵⁷，吸引不少民族慕名而来⁵⁸。

东汉和帝以后，外戚、宦官擅权，政治不利因素导致太学衰败。安帝时期学风败坏⁵⁹，顺帝中兴，力挽狂澜扩大校舍⁶⁰，广招生员，令学生数目激增至三万余人⁶¹，但是时太学已无儒者之风⁶²。桓灵时期，敢言的太学生因「清议」公开抨击宦官专政，而得罪宦官集团，引致两次党锢之祸，大批学生被终身囚禁或诛杀⁶³。灵帝受唆摆设立「鸿门学都」制衡太学，令太学地位下降。汉末的黄巾之乱和州牧割据，使社会不稳、政治黑暗，严重影响太学运作，最终更令教学终止。

（三）太学的教学模式与授课内容

「博士」是教导「五经」的专职学官，所以又名「五经博士」，他们是经学的专家，在太学担任老师的职责。太学学生，在西汉称为「弟子」，而东汉则称为「诸生」。武帝时太学只有五十个学额，筛选条件是「年十八以上，仪状端庄」的官宦子弟⁶⁴，而地方地主子弟也可作为旁听生，是为「受业子弟」。前者有官禄、免役，而后者则要费用自理⁶⁵。

太学的授课形式和现代大学相似，学生以自修为主，大班教导「五经」的正课。光武帝设十四名博士分别教授今文经⁶⁶《施氏易》、《孟氏易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梁丘易》、《欧阳书》、《大夏侯书》、《小夏侯书》、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大戴礼》、《小戴礼》、《严氏春秋》和《颜氏春秋》⁶⁷。正课以外时间，学生可以按个人兴趣学习，他们既可以请教校外名师、高足弟子⁶⁸，也可以和同侪互相交流⁶⁹。太学不设毕业年限，但学生必须通过考试才可以授予官职，所得的成绩和所分派官位相等⁷⁰。

总结

太学既是学府，也是一种仕途机制，学子进入太学的目的是谋求官职，以「五经」为课程，旨在培养德位相称的预备官员。

太学的发展与汉的盛衰互为因果。一方面，汉廷重视教育令太学发展蓬勃，但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太学运作。另一方面，太学的设立推动了社会学习风气，学子修读经典可陶冶性情，因此这个与仕途紧扣的制度也培养不少政治人才。学生居住在校舍与同侪协作，促进彼此交流，一同进学修德，无疑是兼具个人与群性发展。然而，这个制度并未完善，只教授儒家学说难免予人「统治者将个人思想移植于儒家经典，并将统治措施合理化于圣人之言」的猜想⁷¹。不仅如此，博士数目远远追不上学生人数，只能由弟子高足助教，难免影响教学质量。

⁵⁶ 袁弘《后汉纪·孝和皇帝纪下卷第十四》：「永平中，崇尚儒学，自皇太子，诸王侯及功臣子弟，莫不受经」

⁵⁷ 袁弘《后汉纪·孝和皇帝纪下卷第十四》：「外戚樊氏、郭氏、阴氏、马氏诸子弟立学，号曰四姓小侯」

⁵⁸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：「其后复为功臣子孙、四姓末属别立校舍，搜选高能以受其业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经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济济乎，洋洋乎，盛于永平矣」

⁵⁹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：「自安帝览政，薄于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徒相视怠散，学舍颓敝，鞠为园蔬，牧儿芻豎，至于薪刈其下」

⁶⁰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：「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」

⁶¹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：「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诏曰：『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学，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饗会之，以此为常。』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」

⁶²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：「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」

⁶³ 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：「党人既诛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，后遂至忿争」

⁶⁴ 晋文：《汉代太学浅说》，《山东师大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，2001年第6期，页75

⁶⁵ 同上注

⁶⁶ 与古文经相对。古文经在秦始皇「焚书坑儒」及咸阳被攻陷之后所起的「秦火」大量缺失。因此依赖时人口耳相传，重新默写出来，这个版本就是今文经

⁶⁷ 范曄：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上》

⁶⁸ 高年级学生

⁶⁹ 晋文：《汉代太学浅说》，页76

⁷⁰ 同上注

⁷¹ 林晓希：《近三十年来汉代经学研究述评》，《云南社会科学》，2014年05期，页27-31 朱日耀：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》，《政治学研究》，1987年06期